

坚定文化自信是创新社会治理的本源

叶战备

内容提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坚定文化自信与创新社会治理作为七、八两大部分集中阐释,其深层的逻辑是,坚定文化自信是创新社会治理的本源。具体说来,在历史的追寻中文化自信彰显的是社会治理的价值;在传统的继承中文化自信推动的是社会治理的转型;在对外交流中文化自信确立的是社会治理的特色;在实践探索中文化自信丰富的是社会治理的内容。由此,立足包容性、延续性、先进性和信仰性等“四性”坚定文化自信以助力社会治理创新是逻辑与历史、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明智之举,也是落全、落细、落实十九大精神的现实之行。

关键词 文化自信 社会治理 同心圆结构 核心价值观

叶战备,南京审计大学国家治理与国家审计研究院教授 211815

江苏省新型城镇化与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研究人员 215123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1]。同时,他又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坚定文化自信与创新社会治理作为七、八两大部分集中阐释,其深层的逻辑是,坚定文化自信是创新社会治理的本源。正确理解文化自信与社会治理之间的关系不仅是当前我们深入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的需要,也是学界需要进行深入研究的课题。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公民参与涉政网络事件的有序性研究”(批准号:14AZZ015)、江苏省新型城镇化与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现代审计科学阶段性成果。

[1][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5页,第41页。

中国人讲文化,更多是从“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1]这个层面去理解的,所以我们常常说“文化是人民的精神家园”。西方人更多是从文化的拉丁文词根“cultura”(培育)去理解,他们一般认为文化是对本身已经形成的东西进行培育^[2]。尽管这两种理解有着差异性,但都为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源头依据。那么,坚定文化自信是创新社会治理的本源又是缘何呢?

一、在历史的追寻中文化自信彰显的是社会治理的价值

提到中国,我们引以自豪的不仅仅她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更重要的是她的文明没有割断过。换句话说,就是文化作为人民的精神支柱一直在支撑着,中华民族尽管饱受过艰辛,但从没有亡国灭种,如果我们就此把爱国主义、生生不息等归结为我们的文化自信,这也未尝不可,但我们更应该看到在这种历史追寻中的文化自信背后彰显的何尝不是一种社会治理的价值。

先秦是中国文化大发展时期,诸子“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3]，“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4]。孔子更是忧于当时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社会现实,试图通过创立儒学从理论上思考,并在实践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道家无为而治的背后是臣下有为。法家更是“为圣人执要”。一句话,我们的文化从源头就关注和力图解决实际社会问题。儒、道、法等虽经过历代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流派和形态,但其经世致用的特质一直贯穿始终。无论是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思想家掀起的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还是以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为代表掀起的近代经世思潮,其目的都是要提供“匡世济民”的社会治理方案。实际上,从先秦诸子学说、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到近代“新学”,仁政、民本、纳谏、用贤等一经提出,便长期延续,为后人反复讨论和强调,这些文化自信表现的背后恰恰渗透着的是社会治理的价值。

到了“五四”时期,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把中国近代失败的根源归咎于孔子、孟子的学说,进而对之发起了集中猛烈的批判,希望从伦理的层面实现“最后的觉悟”。今天看来,这场新文化运动一方面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另一方面也存在着简单化、情绪化等缺点。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李大钊就主张把孔子区分为真孔子和假孔子,认为真孔子有价值的思想值得继承,而被历代统治者利用的假孔子的思想应该加以批判,这无疑是个文化自信者的表现。令人痛心的还有后来“文革”中的“破四旧”以及今天一定程度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沉渣泛滥,这些文化不自信的做法无一不在冲击着社会治理的价值。

二、在传统的继承中文化自信推动的是社会治理的转型

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最终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当然在人类社会演进的过程中,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呈现出的差异性还是存在的。不过,社会不断从低级向高级迈进具有普遍性。这中间文化自信是通过对传统的继承来发挥对社会治理转型的推动作用的。对此钱穆先生认为,“其实中国历史上已往一切制度传统,只要已经沿袭到一百两百年的,也何尝不与当时人事相结合”^[5]。

[1]《易经·贲卦·彖》。

[2]参见[德]彼得·科斯洛夫斯基:《后现代文化:技术发展的社会文化后果》,毛怡红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

[3]《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4]《史记·太史公自序》。

[5]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序),[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页。

自秦统一六国之后,中国传统社会总体上可以说是皇权社会和家族社会的统一体。在儒家文化的主导下,德治是士绅们的自信之源,教化自然是其社会治理的首选。当然,教化的主导权是控制在精经典典并知所当为的“贤人”(也就是统治者)那里。毛泽东认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1],近代中国,“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2],因而文化革命势在必行,“在‘五四’之前,中国文化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3],“在‘五四’之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4],这种新文化在抗日战争时期称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着我们民族的特性。……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5]。文化是民族的血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立足于传统继承中的文化自信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并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实现了社会治理的转型。

当代中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6]。与此同时,我们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7],这实际上又是一次在传统的继承中依靠文化自信来推动社会治理的转型。换句话说,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文化需要通过解构以适应社会的变化。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导致了“乡村村约”功能衰落、传统文化实用性与功利性特征被放大化以及传统文化故事的负面解读等现象,另一方面导致了组织与个人的关系发生历史性的变化。由此,文化自信的关键在于如何从孕育家长权威转化到孕育制度化的公共权威,从而推动单位组织化社会转向公共社会,形成高度流动的社会治理系统。

三、在对外交流中文化自信确立的是社会治理的特色

中国对外交流无论在古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都非常注重文化交流。习近平总书记在一次演讲中道出:“2000多年来,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先后传入中国,中国音乐、绘画、文学等也不断吸纳外来文明的优长。……中国的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四大发明带动了世界变革,推动了欧洲文艺复兴。中国哲学、文学、医学、丝绸、瓷器、茶叶等传入西方,渗入西方民众日常生活之中。”^[8]与此同时,他又指出,“中国历史上曾经长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没有留下殖民和侵略他国的记录”^[9]。“有着5000多年历史的中华文化,始终崇尚和平,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深深融化在中国人民的血脉之中。”^[10]由此可见,在对外交流中文化自信确立的是社会治理的特色,和谐可以说是中国社会治理的最大特色。

今天我们一旦打开美国白宫政府网站,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美国现总统特朗普的呼吁:“相信你自已,相信你的未来,并再次相信美国。”^[11]当然这一方面给人的感觉是美国崇尚个人自由主义,但另一方面也不能不令人疑问:美国有民族特性吗?换句话说,成为一名美国人到底意味着什么?对于美国人而言,最重要的是他们所信奉的观念,而不是其祖先的血统或来历。美国体现了启蒙运动时代

[1][2][3][4][5]《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84页,第384页,第386页,第387页,第397-398页。

[6][7]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1页,第49页。

[8][9][10]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61页,第265页,第265页。

[11]“Believe in yourselves. Believe in your future. And believe, once more, in America.”—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https://www.whitehouse.gov/>, 2017年12月13日。

的价值观。除了少数怀疑者,革命的一代人对美国信念充满了信心,因此他们不害怕与移民共同分享这一切。唯一的条件就是他们自己的未来与一个开创‘时代新秩序’(这是镌刻在美国国玺上的铭言)的国家的未来联系在一起。”^[1]很显然,冒险是美国文化的底色,不和谐是美国社会治理的特点。

当代世界,全球化浪潮汹涌而来的背后是文化渗透,如何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来坚定文化自信是首要课题。因为,“政治只是全部文化中一项目,我们若不深切认识到某一国家某一民族全部历史之文化意义,我们很难孤立抽出其政治一项目来讨论其意义与效用”^[2]。当然社会治理的特色要求就是“政治一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对此明确要求:“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故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要以理服人,以文服人,以德服人,提高对外文化交流水平,完善人文交流机制,创新人文交流方式,综合运用大众传播、群体传播、人际传播等多种方式展示中华文化魅力。”^[3]

四、在实践探索中文化自信丰富的是社会治理的内容

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同心圆式的基本结构,大体从中心到外层依次为信仰(核心价值观)、主流文化(官方意识形态)和亚文化(大众文化)。三个层次之间的关系借用十九大报告的阐释是,“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4],“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5]。

在实践中,文化三个层次之间往往会脱节,并造成相应社会问题的出现,这既是社会治理的逻辑起点,也是社会治理的主体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在有些作品中,有的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有的是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有的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当作感官刺激的‘摇头丸’;有的胡编乱写、粗制滥造、牵强附会,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有的追求奢华、过度包装、炫富摆阔,形式大于内容;还有的热衷于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脱离大众、脱离现实。”^[6]究其原因,是“浮躁。一些人觉得,为一部作品反复打磨,不能及时兑换成实用价值,或者说不能及时兑换成人民币,不值得,也不划算。这样的态度,不仅会误导创作,而且会使低俗作品大行其道,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现象”^[7]。

实际上,“浮躁”就是当前我们的社会问题之一,演变成社会治理的内容就是如何治理不公问题。邓小平晚年同弟弟邓垦谈话中提到:“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少。所以,我们退休后也不是无事可做。观察社会问题,出点主意,原则上要掌握几条。”^[8]实际上,这是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一种表

[1][美]卢瑟·S·路德克主编:《构建美国——美国的社会与文化》,王波、王一多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7页。

[2]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前言),(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4页。

[3]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61-162页。

[4][5]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2页,第41页。

[6][7]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0/14/c_11116825558.htm。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4页。

现,进一步说,这既是他对“大不相齐不可有,小不相齐不可免”这一文化传统的自信,也是对“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难得可贵的是,他作为一位杰出政治家能够在基于自身文化自信的基础上把“分配不公”上升到社会问题并出主意治理。可见,在实践探索中文化自信不断丰富着社会治理的内容。

五、立足“四性”坚定文化自信以助力社会治理创新

前面我们提到文化的同心圆结构,那是一种理论的静态阐释。实际上文化是一个整体,更是一个生态系统,“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不是一个简单的挑拣问题,而是需要通过长期精心培育达至一种“生态平衡”。换句话说,文化自信也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社会治理创新的步伐既要契合这一节奏,更要善于借力于文化自信的“润物无声”。为此,本文从大圆包含小圆、全体孕育内核的系统观进一步探讨文化发展的包容性、延续性、先进性和信仰性,认为立足“四性”坚定文化自信以助力社会治理创新是逻辑与历史、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明智之举,也是落全、落细、落实十九大精神的现实之行。

包容性不仅仅指的是文化的多彩和多样,更深层次指向的是文化价值的弹性。结合当下我国坚定文化自信助力创新社会治理的要求来看,需要我们思考两个关键问题:中国文化如何得到认同,核心价值观如何凝聚与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对此有精辟回答:“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1]“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发挥好新兴媒体作用,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2]“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3]“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要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要通过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等,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各种社会管理要承担起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作用,注重在日常管理中体现价值导向,使符合核心价值观的行为得到鼓励、违背核心价值观的行为受到制约。”^[4]

延续性就是保持对文化遗产的重视,继续塑造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里,我们又一次感觉到习近平总书记的远见卓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这些思想和理念,既随着时间推移和时代变迁而不断与时俱进,又有其自身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5]这种“独特的精神世界”和潜在的“价值观”支撑的是,“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自强不息,从未放弃对美好梦想的向往和追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夙愿”^[6]。“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7]“在新的历史时期,中

[1][2][3][4][5][6][7]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61页,第162页,第163页,第163-165页,第170-171页,第56页,第49页。

国梦的本质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1]

先进性一方面是指我们文化的社会主义属性的优越性,另一方面是指先进的文化应该是科学的。从根本上说,文化前进的方向取决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社会主义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前进方向,服务于其发展的社会主义文化自然体现了先进性。但在生产力发展还不充分的条件下,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还体现在满足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精神需要这一方面,这时的先进性也就是“大众性”,换个角度,也就是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2]“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3]时至今日,习近平总书记更是殷殷叮嘱:“有的同志说,天是世界的天,地是中国的地,只有眼睛向着人类最先进的方面注目,同时真诚直面当下中国人的生存现实,我们才能为人类提供中国经验,我们的文艺才能为世界贡献特殊的声响和色彩。说的是有道理的。……只要我们与人民同在,就一定能从祖国大地母亲那里获得无穷的力量。”^[4]毛泽东认为“文化是科学的”其主旨是“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5]。投射到社会治理层面,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确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征程中,我国的社会治理系统急需从低流动的分割性的信息系统、信用控制系统、税制和福利系统向高度流动的相应系统转变,同时建立由国家主导的制度化的回应机制也迫在眉睫。实事求是来看,先进文化应包含契约与公民精神、妥协与退让精神,这些先进文化的培育,对社会治理也具有助力作用。

最重要的是要有信仰性,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要坚定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要在坚持宗教信仰自由的基础上,突出敬畏自然的思想,建立一种淡薄的、不刻意的文化认同。科学与信仰是相互助长的。科学和信仰是同心圆。科学是小圆圈,信仰是大圆圈。科学的圆圈越大,信仰的圆圈必然更大。所以,科学越是发达的地方,信仰所起的作用越大。信仰是个人的选择。基于信仰的个性化,应该包容和理解别人的信仰;基于彼此信任的需要,我们应该找到不同信仰中的共有成分,例如善良、诚信、包容、友爱等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是信仰和信任的最高境界。习近平同志指出:“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现象地说,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6]可见,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是党员、领导干部文化的“骨气”和“底气”。与此同时,社会信任和诚信度显然与社会治理成本密切相关。毋庸讳言,当前中国社会有两点突出现象值得注意,一是从管理者角度感觉到的老百姓的“不信任”;二是从社会成员之间感觉到的“互不信任”。支撑“人心”的文化信仰在哪里?佛、道、儒都信,天、地、君、亲、师都拜,强调“因果报应”,显然不合时宜也不是长久之计。现代化的进程中,敬畏自然是信仰空间生成的重要基础。诚如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7]。其次,通过“毛毛雨”的方式建立文化认同,特别是网络虚拟共同体的网络文化共识。唯有如此,我们才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们的社会治理创新才有“压舱石”。

[责任编辑:史拴拴]

[1][6]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56页,第15页。

[2][3]《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30页,第534页。

[4]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0/14/c_11116825558.htm。

[5]《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98页。

[7]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0页。